

中国与新加坡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比较研究

蔡秋玉

内容摘要: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绿色社区建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和新加坡都有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并将儒家文化传统推广到绿色社区的建设当中,两国在促进绿色社区的建设上也都出台了财税激励政策。在对比两国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后发现,中国在政策覆盖面、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延续性、政策激励居民参与、政策协调社区周边环境以及政策扶持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绿色社区 财税激励政策 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052 (2018) 05-0088-07

DOI: 10.16407/j.cnki.1000-6052.2018.05.010

绿色社区是指具备了一定的符合环保要求的硬件设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和公众参与机制的社区。2001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2001年-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指出“绿色社区”的主要标志是“有健全的环境管理和监督体系;有完备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有节水、节能和生活污水资源化举措;有一定的环境文化氛围;社区环境要安宁,清洁优美。”中国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十三五”规划推进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把节能绿色发展理念从单体建筑扩展到城市街区(社区)等区域单元。“十九大”报告中再次论及要开展创建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等行动,将其提升到了更高的战略层面。

目前,关于绿色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社区建设案例以及绿色社区建设存在问题等方面研究文献较多,而从财税激励政策角度研究绿色社区建设的文献甚少。叶青、赵强、宋昆(2014)对美国、英国及中国绿色社区评价体系进行分析,提出优化中国绿色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策略;董杰(2018)认为应从软硬件两方面综合施治绿色社区的建设;陈文宇(2018)分析了英国及丹麦地区低碳社区发展策略,对中国低碳社区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Anthony Morris(2017)对澳大利亚的绿色之星社区进行案例研究,指出政府的启动和资助是实施他们的绿色之星社区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实践财税激励政策促进绿色社区发展成效明显,而且新加坡的华人占了一定的比例,东方儒家的大家庭观点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还把大家庭的这种观念推广到社区,一直采取措施建设有凝聚力的社区,这一点与中国提倡和谐社会的建设不谋而合。

一、新加坡和中国的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

(一) 新加坡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

新加坡政府在2005年启动了关于绿色建筑的绿色标志计划,但是到了2009年制定第二个绿色建筑总体规划时才意识到绿色住宅建筑的标准不应仅仅局限于公共区域,如公共走廊和电梯大厅等,还必须包括私人区域,才能确保整个建筑的可持续性,因此,建设局与包括行业参与者、普通大众、建筑业主和租户在内的

收稿日期: 2018年7月27日

作者简介: 蔡秋玉,福建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 会计与税收。福州市,350028。

关键利益相关者建立更广泛、更紧密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以提高人民的福祉；并于同年出台了针对区域规划的评价体系，2017年已更新至2.1版本。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对空调、干衣机、灯具、冰箱、电视机等家用产品强制加贴能源标签，将水龙头、小便池、抽水马桶、洗衣机等家用产品纳入强制性节水标签计划，对空调、冰箱、干衣机、灯具等家用产品实施最低能效标准。除了实施这些强制性政策外，新加坡政府还采取必要的财税手段来激励绿色社区的建设。

1. 反向财税激励政策

反向财税激励政策包括对住宅垃圾收取处理费、处罚乱扔垃圾、家庭水电实施阶梯价格等。新加坡对住宅户是根据住宅情况定额按月收取垃圾处理费，组屋（政府承建的公共房屋）每月是8.25新元，排屋别墅则是27.47新元。^①根据2014年通过的《环境公共卫生（修正）法案》，对于乱扔垃圾将被处于重罚，首次乱丢垃圾者，最高罚款2000新元，第二次为4000新元，第三次或以上为1万新元。家庭水电实施阶梯价格，但电费每三个月根据能源市场管理局的准则进行调整，水费由水价、耗水税和污水处理费三部分构成，征收耗水税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意识到水资源的珍贵，从2018年7月1日起水费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新加坡2018年7月1日以后水费 (单位: 新元)

每月用水量	0立方米~40立方米	>40立方米
水价	1.21	1.52
耗水税（水价百分比）	0.61（50%）	0.99（65%）
污水处理费	0.92	1.18
总额	2.74	3.69

资料来源：新加坡公用事业局网站：https://www.pub.gov.sg/Documents/Dom_Usave_EngChi.pdf。

2. 正面财税激励政策

新加坡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采用了正反向政策结合的方式，除了上述反向财税激励政策，还采取了一系列正面财税激励政策。因为水费从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7年都没有进行调整。因此，政府在2017年2月宣布在2017年7月1日和2018年7月1日分两个阶段调整水费，为帮助住户应付水费调整，政府随之在2017年7月为符合条件的住户永久性调高常年水电费回扣，帮助居民抵消部分水费，回扣额增幅从40元到120元不等。其他的财政资助项目见表2。

表2 新加坡政府出台的绿色社区激励政策

政策名称及出台部门	目的	资助内容
3P合作基金 (国家环境局)	鼓励民众、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共同努力，发起创新和可持续的环境倡议，以促进当地社区环境产权的保护	培养环境的倡导者和拥护者；鼓励社区参与环境活动；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3R基金 (国家环境局)	促使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增加可循环利用的固体废弃物或减少固体废弃物
CIF酷点子基金 (国家环境局)	解决当地社区的环境和问题	解决当地社区中产生的环境挑战和环境问题；开发移动应用程序
可及性基金 (建设局)	行动障碍的人能够与家人、朋友和更广泛的社区保持基本的联系	升级现有建筑的无障碍设施；建造无障碍厕所、无障碍坡道和改造家庭设施
绿色家园计划 (建屋发展局)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家园	改造政府组屋

绿化社区基金 (建屋发展局)	鼓励更多来自民间的想法或意见	减少维护和材料浪费、循环利用、节水、节能、改善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的联系
亲切与活力社区基金 (建屋发展局)	通过项目和活动将居民聚集在一起,促进邻里关系,培养更强的社区意识	开展促进邻里关系的项目和活动
消音建设基金 (国家环境局)	减少建筑噪音对噪音敏感场所的影响	消音装置建筑机械、噪音控制设备及创新性的建筑噪音控制技术
小贩们的生产力补助 (国家环境局)	提高生产力	食品摊贩的厨房自动化设备
充满活力的小贩中心 (国家环境局)	提升小贩中心的活力,加强小贩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社区与小贩中心共同参与的活动
环境之友奖 (国家环境局)	鼓励个人继续努力保护环境	表彰保护、促进和改善环境的个人
好邻居奖(建屋发展局、 人民协会、国家发展部)	促进邻里关系更进一层	表彰促进邻里关系的居民

资料来源: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建屋发展局、建设局等网站资料整理。

总体上,新加坡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处罚力度大,财政投入力度也大,资助项目多。但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中较少运用税收手段抑制社区环境污染。目前,新加坡政府已经确定计划从2019年起实施碳排放税,不排除未来通过更多税收的方式促进绿色社区建设。

(二) 中国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

中国从2001年首次提出开展创建“绿色社区”活动至今,已经十余年了,也相应地制定了一些政策,如实施能源效率、水效标识制度等,但绿色社区的建设发展缓慢,现行并没有直接针对绿色社区的完整财税制度体系,只有一些零星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反向财税激励政策和正面财税激励政策。

1. 反向财税激励政策

1999年,中国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的意见》,要求各城市要在供水价格上加收污水处理费,启动全面征收污水处理费制度。2002年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关于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的意见》中规定要缴纳垃圾处理费。2011年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要实行居民阶梯电价,2012年6月14日,国家发改委表示从7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阶梯电价。2014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按缴纳义务人的用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出台“指导意见”,要求2015年底前,所有设市城市原则上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2014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所有已通气城市在2015年前均应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水、电、气等民用能源实施阶梯价格传递理性消费、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价格信号。从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来看,还是兼顾了居民的承受能力,保证大多数居民这些支出基本稳定,但节能的意识增强了。

2. 正面财税激励政策

(1)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4年发布的全国“绿色社区”创建指南(试行)规定从2005年起,每两年对活动中取得显著成效的“绿色社区”、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2) 2009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文规定对高能效的节能产品进行财政补贴。

(3) 2012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对需要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贫困家庭,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补助。《无障碍环境建设“十三五”实施方案》提出要提供资金保障,

加快推进社区等公共场所和设施的无障碍改造。

中国绿色社区建设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采取经济激励政策，以“利益驱动”效应刺激居民参与绿色社区建设，成效渐显。

二、中新两国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比较分析

（一）政策的涵盖面

新加坡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涵盖了节能、废物循环利用、无障碍建筑、邻里关系、环保意识、人才培养、环保创意等方面，既有硬件方面设施的建设，又有社区关怀等内涵方面的建设。比如建设局拨款4000万新元用于建筑的无障碍改造，酷点子基金则是鼓励来自社区的想法或意见，每个项目最高可获得2万新元或项目成本80%的资助，二者取低者。同时，在项目申请人方面也没有设置过多的条件。比如，3R基金的申请人只要是在新加坡注册的组织或公司即可，而针对个人的奖项，如环境之友奖，不受组织性质的限制，也抛开年龄的约束，上至老人，下至儿童都有申请的资格。

从中国绿色社区的财税激励政策来看，覆盖面小，仅覆盖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节水、节电、节气、无障碍建筑建设等方面，与新加坡的政策相比，缺乏社区活动、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财税投入，在奖项方面，表彰的个人当中基本上没有儿童。中国人讲究亲情，习惯群居，建立、维系和睦家庭以及与邻里之间友好的人际关系，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而现实情况是很多城市社区邻里间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缺乏从小培养绿色社区意识的财政投入，对绿色社区建设持续性的动力有限制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大在这些方面的财政投入。

（二）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延续性

新加坡绿色社区的各项财税激励政策内容详细，收费标准、资助对象、资助条件等内容明确，可操作性高。另外，绿色建设也不是一时的兴趣，而是长期坚持的坚定信念，其财税激励政策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一方面，相关的财税激励政策不断升级，以保证在不同阶段财税政策内容的继承性及时间的持续性。比如，可及性基金用于无障碍建筑的改造，随着社区需求的变化不断扩大受益面，惠及更广泛的人群，从残疾人到老年人、婴幼儿，甚至年轻人也包含在内，可以为年轻人设计更方便的路线等。原先可及性基金的有效期间是从2007年到2016年，现已延长至2021年，用于家庭的可及性基金资助比例由原先建造成本的40%增至60%。另一方面是资助的项目都强调可持续性。虽然具体项目针对性会有所差异，但对可持续性的要求则是共性。比如3P合作基金强调要有可持续的环境倡议，同时支持的项目要有长期影响；绿化社区基金则是强调提出的解决方案要有可持续性。

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财税激励政策内容都比较泛，可操作性低。比如无障碍改造，只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补助，但“适当”到什么程度却没有明确的标准。另外政策的制定往往会滞后于环境发展的需求。比如2001就已经提出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2012年进行更新，但在居住区的无障碍改造方面主要考虑的还是方便残障人士出行，而没有涉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的需求。2002年中国相关部门就已经制定政策规定了生活垃圾收费制度，但直到2018年7月国家发改委才出台政策要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政策需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及时修改、完善，保证连续性，居民才能有长远规划与发展，才能保证政策顺利实施。

（三）政策鼓励全民参与方面

绿色社区的建设与每一位居民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因此新加坡政府通过实施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和激励全民参与绿色社区的建设，对资助的项目作了一些特别的设计。一方面，资助的对象和形式要求比较宽松，限制条件少，如“环境之友奖”不分行业、职业、年龄等，只要对环保作出贡献，都可以申请该奖项；又如绿化社区基金项目，每个项目最高的资助金额是10万新元，只要是来自社区原创的创意，可以是切实可行的或可实施的产品、系统，也可以是过程或工作方法，这样不作过多的限制能吸引众多的居民参与。而且获得奖项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好邻居奖”获奖者有小孩也有老人，做得也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只要对邻居

友好,比如热情跟邻居打招呼、做手工送邻居等,就有获奖的机会,以此鼓励改善邻里关系。另一方面申请条件又作严格的限制,必须是不同年龄层的参与,比如亲切与活力社区基金项目必须涉及社区中不同的团体和个人,如青年、老年人和企业等,根据项目类别分别给予最高1000、5000和20000新元的资助额度。

中国的政策缺乏则对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有力刺激。居民是社区的主体,是影响绿色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绿色社区建设不仅是社区环境的绿化等景观改变,同时也是人文环境的建设过程。但中国的政策当中这方面的投入偏少,加之对绿色社区的重视程度和宣传力度不够,社区居民对绿色社区的内涵还不是特别的了解,认为绿色社区建设就是社区的绿化建设,会增加经济投入,同时在短期内面临生活不便的情况,特别还面临改变不环保的生活习惯,一时难以接受。另外,开展的一些社区活动多流于形式,没有持续性,缺乏社区居民的参与,甚至对绿色社区的建设产生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并没有真正融入活动,导致社区居民的活力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影响了参与绿色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四) 政策在处理外围环境对社区的影响方面

社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是相对独立的,但并不是割裂了与外界之间的关系,新加坡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体系中就很好地协调了社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资助成立静音建设基金,对建筑商根据项目金额资助15万新元或20万新元,对供应商资助15万新元,资助公司采用带有静音装置建筑机械、噪音控制设备及创新性的建筑噪音控制技术来减少噪音,从而减少建筑噪音对噪音敏感场所住宅区等的影响,以创造更安静的生活环境。此外,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还妥善地解决了小贩与社区之间的矛盾,国家环境局一方面提供了“小贩们的生产力补助”项目,资助食品摊贩购买合适的厨房自动化设备,资助额度为设备的80%,3年最高为5000新元,帮助他们提高生产力,抵消他们的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投入资金发起“充满活力的小贩中心”项目,每项活动的资金上限是2000新元,定期在小贩中心举行社区与小贩中心共同参与的活动推动社区居民接纳小贩中心,提升小贩中心的活力,加强小贩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而中国的政策则未辐射到社区周边环境。绿色社区改造仅针对本社区进行,社区与社区衔接的区域成为了政策真空区域,社区周围的小贩叫卖声、汽车的鸣笛声、工地的机器声以及中国特有的广场舞等影响社区的环境,靠目前采取城管执法或集中清理整治不是长久之计,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毕竟小贩给社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而广场舞也是社区活动的一种形式。如何有效化解这些冲突是中国今后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五) 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方面

新加坡非常重视利用技术促进绿色社区的建设,资助研究节能、减少材料浪费、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技术、创意以及开发与绿色社区建设相关的应用程序等。目前已开发的应用程序包括“家庭能源审计员”、“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器”、“我们的中心地带”等,每一项应用程序都给绿色社区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家庭能源审计员”帮助家庭检测出家庭的高能耗电器,想办法减少电费账单。“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器”可以通过计算不同型号的空调、冰箱、烘干机和电视的生命周期成本,帮助做出有见地的购买决定以节省成本;在“我们的中心地带”里可以了解关于城镇或社区广场活动的信息,这也是建设有活力和凝聚力社区的一部分。而且榜鹅镇(Punggol)和勿洛镇(Bedok)的“我们的中心地带”应用程序还是政府部门与社区居民共同开发的。目前,国家环境局提供的酷点子基金支持社区居民开发移动应用程序,为每个项目最高资助2万新元或项目成本的80%,二者取低者,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环境信息,比如小贩摊位的等级分类、回收箱的位置等,还可以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促进其环保习惯的养成。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居民能够容易获得环境信息,以便在日常生活中作出明智的选择。

目前,中国在社区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应用程序开发等方面的财政投入还不够。手机普及率越来越高,出门一部手机几乎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如购物、缴费等等,但却没有充分利用手机建设我们的绿色社区。一般小区有建立QQ群或微信群,但也只是用于平时沟通,没有充分利用手机的信息直达通道宣传绿色社区建设、普及绿色社区知识、组织绿色社区活动等;在结合技术引导、帮助居民节能方面上也非常薄弱。

三、中国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的方向选择

中国的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新加坡的一些财税政策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可以借鉴其先进之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

(一) 加强顶层设计

中国绿色社区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政策的设计思路还是“胡萝卜+大棒”，既要有反向财税激励政策，又要有正面财税激励政策，以正面财税激励政策为主，辅以反向财税激励政策，以吸引社区居民参与绿色社区的建设，形成“自下而上广泛参与，自上而下监管”的模式。国家要根据绿色社区的主要标志出台推动绿色社区发展的财税激励政策，指导推动各地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新加坡80%的房子是由建屋发展局开发，便于统一管理，而中国不一样，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情况、生活习惯等情况也千差万别，因此绿色社区的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出财税政策的地域性。同时，建立财税激励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只有实现政策的持续性，才能保证绿色社区的建设持续健康发展，避免遭遇发展的瓶颈。

(二) 完善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的内容

1. 激励主体多元化

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在绿色社区的建设上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企业所有的员工也都是社区的一分子，倡导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引入企业支持绿色社区建设。新加坡政府与供应商合作，为购买节能电器的居民提供捆绑折扣，政府发挥了桥梁作用。中国虽然也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但采用的是财政补贴方式。今后可以转变激励方式，由企业直接打折。此外，还可以鼓励企业与社区居民、政府部门等联合发起保护环境的活动。

2. 激励对象可以涵盖各年龄层

在今后的政策设计中要加大对青少年的激励政策。首先，环境保护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坚持，从小就要养成环境保护的习惯；环境保护也不是“高大上”和遥不可及的事情，也不只是属于大人的事情，青少年也可以做得到。通过对青少年的激励可以激发他们参与环境保护和社区建设的激情。其次，无障碍建筑的受益对象要考虑到婴幼儿。中国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意味着催生新一轮的“婴儿潮”。在绿色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到哺乳室等的建造，构建一个友好的涵盖儿童、老年人以及行动有限的其他人具有独立和积极的生活方式，这也体现了社会的包容性。

3. 在以下方面财税激励政策要给予更多倾斜

(1) 开展社区活动

和谐的邻里关系是创建绿色社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财政投入显然是不足的，可以学习新加坡的做法，设计和组织持续性的环保活动，在增长知识、提高技能的同时也促进了社区绿化和邻里关系的和谐，还传递了环保的理念，可谓一举多得。当然，在设计活动时要精心考虑，要能激发各个年龄层成员参与的热情，让大家理解认同。同时，要能够将环保的理念融入活动当中，彼此分享经验，促进邻里关系升温。

(2) 助推绿色社区建设的技术

绿色社区的建设与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绿色社区建设中要重视发挥科技的作用。一是要加大在社区中推广节能产品的使用，淘汰高能耗的设备和工艺；二是增加对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的技术研究的投入；三是研制、开发与建设绿色社区相匹配的应用程序，方便居民，促进社区居民养成环境保护的习惯。这些技术可以由企业与社区居民共同合作开发，企业拥有技术上的优势，而社区居民则对社区的环境问题比较熟悉，共同合作推动绿色社区的建设。

(3) 妥善处理社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财税政策在制定或实施的时候，不能片面地看待，更不能顾此失彼，而是要实现与周围环境、与城市的健康发展。新加坡解决外围环境与社区之间的方式为中国同样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思路，“以人为本”，打“感

情牌”，不能采取正面打击，那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能够加大财政投入，给小贩、跳广场舞的居民等提供场所，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三）强化政策落实措施

为保障绿色社区财税激励政策的顺利推进，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宣传和志愿者培养两方面比较有特色。一是深层次、大力度宣传。政府通过网络、手机、社区活动、账单等方式介绍各种各样的节能方法、节能成效以及解决方案等。特别是充分利用水电费账单，账单经过精心设计，采用图表表示住户水电用量与其他家庭的比较，提供个人化的节省水电贴士，每个家庭每月还会收到一份能源使用情况的报告。通过积极、全方位的宣传，新加坡居民的环保意识很强，并养成了把环保意识落实为行动的生活方式。二是精心培育志愿者。新加坡政府对志愿者进行了精细管理，将志愿者分为“培养”（cultivate）、“启动”（activate）和“促进”（facilitate）三个不同类别，每一类志愿者的工作内容有所区别。同时对志愿者进行技能培训，与行业利益相关者进行接触、交流，提高素养，反过来志愿者将他们的技能、知识和资源运用到社区建设当中。

中国在绿色社区建设过程中政策实施措施不够完善，需要强化政策实施保障措施。一是要加强宣传，通过社区活动、网络、手机等多种手段进行宣传，收集社区家庭的节能信息作为后期节能措施与改进的重要参考，细化提供信息的内容，最好节能的成效能以金额的形式体现，社区居民才更有动力，同时也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二是大力培养志愿者队伍，可以根据志愿者工作的内容或者年龄进行分类管理。同时不能仅依赖于志愿者的热情来推动工作，必须考虑他们长期的能力培养，以吸引人们加入。

中国同新加坡一样较少运用税收手段解决绿色社区环境污染问题，与其他手段相比，税收的规范性、强制性更明显。因此，要摸索可行的税收政策，在适当的时候要逐步开征垃圾税、固体废物税、水污染税等绿色税收，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强化居民的节约意识，提高绿色社区建设质量。当然，在采用税收手段的同时，注意与水、电、气等民用能源收费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作用。

注释：

①数据来源：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网站，<https://www.nea.gov.sg/our-services/waste-management/waste-collection-systems>。

参考文献：

- [1] 董杰. 新时代我国绿色社区的建设与完善 [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8 (01): 91-96.
- [2] 叶青、赵强、宋昆. 中外绿色社区评价体系比较研究 [J]. 城市问题, 2014 (04): 74-81.
- [3] 王芳. 生态责任、草根行动与低碳社区的能力建设——英美案例及其启示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06): 61-66.
- [4] 梁莹. 绿色社区中的公民治理：绿色志愿者与社工的伙伴关系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 (04): 114-120.
- [5] 陈凯芳、朱隆斌. 英国低碳社区挑战项目的经验及借鉴意义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3 (12): 37-41.
- [6] 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 公众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7 (07): 118-245.
- [7] Anthony Morris, Jian Zuo, Yutao Wang, Jiayuan Wang. Readiness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Green Star Communities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 (03): 308-317.

（责任编辑 陈彤）

In views of the added value chains an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structures of commodities , the analysis is done about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goods trade under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India. The research shows the most China exports to India are the high-tech and the export structure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under the Lall's classification. Meanwhile , in view of the added value chains , China's exports to India with unit price advantage mainly focus on primary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SITC top classification , which have strong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China's unit price advantage is relatively weak in manufactured goods , which also have weaker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comparing to the primary although this relationship is strengthened in recent years. This resul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according to the Lall's classification and in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 that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 especially for the high-tech , should be strong considering two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eds. Then , the reasons are analyzed , which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improving the range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goods trade with India.

An Analysis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hen Tong (80)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nefited from developed levels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advanced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paradigms , as well as a globalized trading system. The prosperity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nefited from the high financial support of government ,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system of production and science , and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industrialization stage. Among them , the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 lay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 which enables the market to develop continuously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until the layout of globalization is realized. Despit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it has created a superpower in the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paper aims to enlighten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for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scal and Tax Incentives Policies for Green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Singapore

Cai Qiu-yu (88)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 gree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oth China and Singapore have strong Confucian family values and have extended the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communities. Both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fiscal and tax incentiv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communities. After comparing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of green communities in the two countries ,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policie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erms of coverage , operability and continuity , encouraging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 coordinating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the communities and suppor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fore ,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communities in China.

A Study on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 Reshaping of Vietnamese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Jiang Yu-shan (95)

As an emerging economy , Vietnam has built hundreds of economic zones of different forms since it put forth the policy of economic innovation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Economic zones of various types have played an in-